

社會學會界

月六年九一國民

卷四第



要目

- 住在農村從事社會調查所得的印象 李景漢
- 社會生活的心靈基礎 許仕廉
- 北平監獄教誨與教育 嚴景耀
- 荀子之社會的教育論 翟世英
- 上海消費合作社調查 張世文
- 社會學的生物學派 高君哲
- 北平工會調查 于恩德
- 福州蟹民調查 吳高梓
- 對於無產階級社會態度的一個小小測驗 黃公度
- 瀘寧道上農工新村考察記略 萬樹庸
- 宣傳及其影響於中國社會變化的討論 吳榆珍
- 燕大男生對於婚姻態度之調查 葛家棟
- 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概況 于恩德

社會學界 第四卷

論著及研究

住在農村從事社會調查所得的印象

許仕廉 (五)

社會生活的心靈基礎

嚴景耀 (三)

北平監獄教誨與教育

張世文 (三)

荀子之社會的教育論

瞿世英 (三)

上海消費合作社調查

張世文 (九)

社會學的生物學派

高君普 (八)

北平工會調查

于恩德 (二七)

福州貧民調查

吳高梓 (四)

討論

對於無產階級社會態度的一個小小測驗

黃公度 (五)

海寧道上農工新村考察記略

萬樹庸 (八一)

宣傳及其影響於中國社會變化的討論 吳楨珍 (二五)

燕大男生對於婚姻態度之調查 葛家棟 (二〇五)

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概況 子恩德 (三三)

書目

社會調查及社會統計英文書目 許崇善 (二四五)

關於中國人口墾殖種族諸問題中英書目 牛鶴齡 (二七)

附錄

一 燕京大學社會學及社會行政學系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工作略述 記者 (一)

二 燕京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服務學系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度報告 許仕康 (二)

三 同上英文報告 (七)



住在農村從事社會調查所得的印象

李景漢

「到民間去，回鄉村去，鄉村自治，耕者有其田，增進農人生活」是北伐成功後所常引用的新成語。作者就在民國十七年夏季正當這類口號喊得很響亮的時候，實行「下野」，到現在差不多兩年了。從前亦嘗注意鄉村問題，也常下鄉去看，但總沒有像這次住在農村和農民打成一片的從事研究。雖然為時不久，但已走上認識農村社會內容的路程，也將已往對於鄉村的觀念改變了不少，又深一層的知道書本裏面關於中國鄉村的見解有許多是不符事實的理想，且更覺得鄉村問題的重要。這句「中國以農立國」的老生常談，實在是不錯的，中國的社會到底是屬村落的社會，中國的國家根本是三十萬左右村莊合成了。城市之在中國，好像牛身上的「撮毛而已」。而自來謀國者，多在這撮毛裏想方法，不於大本尋求新生命，國家如何能有出路呢？可幸近來已經有人似乎果真覺悟鄉村問題的重大，政府也公佈了一些關於農村的法規，但若對於農村社會的自身沒有充分或至少相當的了解，

僅圖表面的鋪張，就草率從事，一定不免發生流弊，也許未能救國，反倒病民，又仍然叫人失望。可是中國地廣人衆，且向來有「百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的說法，通盤的了解，不是在短時期內能够辦到的事，非大家趕快起來在中國各處分工合作的調查研究不可。若能如此認真進行下去，終有收相當效果及大成功之一日。作者不過開始研究，尚在繼續工作，對於鄉村的種種問題，不敢輕下結論，且僅限於一個縣內一部分鄉村的情形，祇願將一些稍有把握的事實簡略的寫出來，供給研究社會學者一點參考的材料，也許有拋磚引玉的功用。

作者常住的地點，是河北省定縣翟城村，研究的界限不出定縣，而特別著重附近翟城周圍的六十二村莊。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選定縣為華北試驗區，作研究試驗「文藝」「生計」和「公民」三種教育的地方。先從東亭鄉村社會區作起，今改稱第一鄉村社會區，包括大小六十二村。會內設社會調查一科，從事調查鄉村社會實況，為進行其他

各部科工作的基礎。此種生活調查，於進行時非常困難，很容易引起本地農民種種的懷疑與誤會。因為近年以來，政府時常向他們增稅加捐，軍隊則索要車馬，強拉夫役，已經把他們害得好苦，如何能怪他們一聽調查二字，就如大禍之將至？幸而平教會的工作，例如設立平民學校，普及農業科學等事業，已經博得本地人民的同情和信仰。因此認真的實現社會調查，在定縣的機會，大概比在中國任何鄉村地方都好。作者能得着這一個良好的所在努力尋求真理，可算是非常僥倖了。現正與本科同人將各項鄉村問題分類研究，希望此後對於社會科學有相當的貢獻，也使有志改造鄉村社會者計劃方案的時候，有些可靠的根據。

定縣有模範縣之稱，窯城村又是中國創辦最早模範村。其實此地的社會狀況與中國北部其他鄉村大致相同，但至少有四特色是許多地方趕不上的，也由此發得模範的稱呼。作者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定縣的井多。定縣全境遍地是井，除去不能掘井和不必有井的所在以外，一切農田無不有井。本地土質並非極好的土壤。因為農民深知鑿井的好處，不但農產量大增，並且逐年收穫，將華北極重要的旱荒問題，可以說是大致解決了。普通每井可澆田地三十畝，大者可澆四十餘畝。窯城村一村村內有井九十六口，村外農田有井二百九十四口，共計三百九十四口，平均每家有一口井。以附近的六十二村計算，村內有井一千七百八十一口，村外有井四千四百二十五口，兩項合計六千二百零六口，平均每村內井數計二十九口，村外井數計七十一口，總合每村

有井一百口，約每兩家有一口井。普通井口至井底之深度約在二十呎左右，井口直徑約五呎，井底直徑約七呎。普通每井須用五十工，連建築材料計算在內，費用約七十元。民國九年時，北五省發生空前旱災，唯洋義賑救災總會在定縣辦理賑濟後，更進一步舉辦防災工程，貸款與農民掘井，成效大著。民十以後，農民乃自動大鑿其井，至十五年時，已經遍地皆井。又兼此處人民非常勤苦，每當春旱缺雨時，則見不分男女老幼，皆到井上搖轉辘轳，每井同時可有三把。亦有井內安放水車，用牲口拉轉者。

定縣不但到處有井，並且到處有樹。定縣城牆外附近滿栽樹木，綿長四十里，無一處間斷，皆已長成大樹。按時砍伐補植，實不難得。全境內凡不能種穀之地，無不試種各種樹木。定縣可謂人盡其力，地盡其利了。

婦女纏足的陋習，在中國北部除山西外，仍然到處盛行。在定縣則顯然不同。不滿十三歲的幼女都是天足，十三和十四歲的女子中，天足者佔百分之九十六，十五至十九歲的婦女中，天足者佔百分之八十二，至二十四歲者中，天足者約佔半數。如此年齡愈高，則纏足者之百分比亦愈增，天足者則遞減。總之，已經纏足的青年婦女，大半皆已放足，幼女皆已不纏。此後婦女纏足的惡習，在定縣算是完全革除了。這也實在是一件比較難得的事。即以北平一帶地方而論，青年婦女幼女之纏足者，仍然到處可見，尚遠不及距萬京五百里的定縣。他縣情形更不必說了。定縣婦女不但在放足一事開風氣之先，其他方面亦有可稱道者。本

地不但女生大多數皆已剪髮，鄉間婦女剪髮者亦日漸增加。無論已嫁及未嫁之婦女，皆從事家庭工業，春夏皆至田間與男子一同工作。她們的裝束樸素而雅致，且行動自然，路遇行人，並不故意掉臉低頭，無平素婦女忸怩之態。

定縣人民對於教育非常著重。鄉村農民皆盡其力之所能及，使子弟入學。大農不必說，即有田不滿百畝者，亦肯供給子弟畢業中等以上學校，實非他處一般農民所肯作。定縣東亭鄉村社會區之六十二村內，曾在中學畢業者及中學以上程度者，共計三百零八人，內有二百七十六男子，三十二女子。平均計算，每村有五個中學畢業者，內四個半為男子，半個為女子。每三十四家有一個中學畢業生。其在專門學校及大學畢業者，所學門類以教育為最多，法科次之，醫科又次之，再次為工業、商業及農業等科。其中有留學日本、法國與美國者。六十二村內，有小學校六十三處，內有初級男子小學四十三處，初級女子小學十四處，初級男女小學兩處，初高兩級男子小學三處，初高兩級女子小學一處。其中民國以前即已成立者，佔三分之一。前後在初級小學畢業者，至少計四千零六十五人，高級畢業者計五百八十人，共計四千六百四十五人，平均每村合七十五個小學畢業者。民國十七年，六十二村內，計有小學學生二千零一十六名，內有男生一千七百五十名，女生三百零一名，平均每村三十三名。學生之家長為農者，佔百分之九十三。男子在初級小學畢業後即種地者，佔百分之七十一；升入高級者，佔百分之十九，其餘多半學

買賣或手藝。女子在初級小學畢業後即在家學女紅者，佔百分之七七。定學者佔百分之二十三。半路退學者中，百分之九十是因為家貧。六十處小學全年費用，共計一萬三千九百二十元，內百分之五十六是開銷薪金，普通每校全年用費約在一二百元之間。高級小學的費用，有達一千五百元者。六十二村小學之收入來源，以學田租出所得之租金為最多，佔一切收入總數百分之四十一。其次為地畝撥款，佔百分之三，即學校經費不足時，由村中各家按地畝之多少平均撥派。再次為地用款，佔百分之十一，即將農民買賣地畝所納經紀費的百分之二十五，撥歸小學經費。其他來源為縣政府之補助金、學校基金之利息、學生學費及青菜牙捐之一部分。有學田之小學，佔百分之七十八，其中不到二十五畝者，計二十處，二十五畝至未滿百畝者，計二十一處，百畝以上者八處，最多者為五百餘畝。不收學費的小學有十九處。其他小學收學費的方法不同，按照學生家中地畝多寡而定學費數目者約佔半數，其他學校有按照年級收不同之學費者，有按本村學生或外村學生而有差別者，亦有學費一律相等者。六十三處小學，除一處外，皆無暑假，而皆有一年假一個月，麥秋假三星期，大秋假四五星期，全年放假約三個月。六十二村共有七十八個小學教員，內有男子六十八名，女子十名。其中百分之七十八是在本縣範範學校及中學畢業者。教員中從事教讀未滿五年者，佔百分之五十八，已滿五年及以上者，佔百分之四十二。教員年齡未滿二十五歲者，佔半數，未過三十歲者，佔三分之二。男教員尚未結

婚者，祇有二人，十個女教員中，未結婚者，有五人。教員授課之時間頗長，每星期內超過三十小時者佔過半數，且有在四十小時以上者。他們擔任的科目亦甚多，擔任八個科目以上者佔過半數，有多至十二科目的。教員之薪水頗低，全年薪金不滿百元者佔過半數，普通自八十元至一百二十元。大多數教員的薪水不足養家的費用。因此教員多是出於有產業的家庭。家中無田地者，祇有一女教員，有田地二十至四十畝者，佔教員總數的四分之一，超過四十畝者佔過半數。五分之四的教員家中，皆有二千元以上的產業，過半數的教員家中，皆有四千元以上的產業。教員亦多是出自大家庭，過半數的教員家中人口超過十人。教員中百分之九十四是生於本縣，祇有六人生於鄰縣。

定縣於整井、植樹、放足和教育能有現在的成績，大半是由兩種動力。最早是受了翟城村的影響。前三十年有翟城人米迪剛先生留學日本，留心考察彼邦最著名之模範村。回國後，即於二十五年前與其父兄等開始經營翟城為模範村，早已有相當的成績。例如關於村治者，則有村治組織大綱，村公所辦事規則，村會議事規則等項。關於財產者，則有宣講所、圖書館、典閱報所、自治講習所、樂賢會等。關於風俗者，則有德育會、改良風俗會、勤儉儲蓄會、輯睦會、愛國會、查禁賭博規約等。關於教育者，則有計劃、教育會、貸用儲金會、國民高等男女小學校、半日學校、初農方面，則有提倡整井，看守禾稼規約，保護森林規約，防除害蟲，會的人離開鄉村，必使鄉村社會才財兩缺，妨礙農村的發展。

產物製造物品評會。此外有衛生所，共同保衛辦法，平治道路辦法，清理地產法，戶口登記法。現在村中兒童皆能入學，成人亦少有不識字者。本村在中學、大學及留學者，已達四十四人，內有三十三男子，十一女子，平均每八家有一個中等教育以上程度者。大多數家庭皆有農副業。村中道路平坦，廁所潔淨整齊。風習敦厚，鴉片及賭博等早已絕跡，即連紙煙亦少有用者。廟宇完全改為學校，他種迷信亦漸革除。自急訟會成立十餘年來，從無至縣公署訴訟者。以三百餘戶之農村而有如是之成績，實屬難得。因此定縣全縣頗受此村之影響。再者，民國三四年間孫德齡為定縣知事，指翟城村為模範村，以定縣為模範縣，認真舉辦一切農村改造事業，成效很好，為定縣社會事業立了基礎。由這兩種主要動力，遂有定縣今日之特色。從可知鄉村事業不怕難辦，全在人為。若受高等教育者都有米氏的熱心，為縣知事者皆如孫氏的肯幹，則中國農村社會雖大處處是成績，是希望。這是作者很深的感想。又有一項極應注意的現象，即鄉間人民知識簡單，非有才德兼全的好人作他們的領袖，不能舉辦甚麼規模較大的事業。可是顯然的理會有才幹的人大半不肯到鄉間服務，而農村中優秀分子又都往城市跑。這與改造農村事業大有關係。如何養成鄉村領袖，及留住鄉村原有的人材，甚麼有用的人願求鄉間作事，是目下極須注意研究的問題。普通的農民移居城市來謀生，不見得好，因為鄉間人口太稠密了。但有能力的人，好人，及有錢的人離開鄉村，必使鄉村社會才財兩缺，妨礙農村的發展。

定縣之特色有如上述。再簡略的提一提其他的鄉村社會現象。先從家庭和人口說起。中國農民家庭的大小是個不清楚的問題。雖在他處已有一些小規模的調查，但大半不甚仔細，也不可靠。因為鄉下人平時很容易將家中小孩不計算在家庭人口的數目裏，亦有種種原因，有時將女孩除外，亦有時把壯丁除外。在東亭鄉區六十二村，按照各種農家數目之百分比用選樣法曾詳細調查了五百農家。平均每家人口數目是六口半人。很顯然的現象是：家中的田地畝數愈多，則人口亦隨之增加。平均計算，不滿五十畝地的家庭是六口人，五十至未滿百畝的家庭是十口，百畝及以上的家庭是十三口。以五十及六十人的家庭為最普通，七口及八口者次之，二十口及以上的家庭僅佔百分之一。再將家庭人口的關係分析來看，男家主人數佔家庭中一切人口數的百分之一十四，無丈夫之女家主及主婦佔百分之十二，子佔百分之二十二，女兒佔百分之十二，其他父母、兒婦、弟兄等人口，共佔百分之四十。近年以來，中國北部鄉村家庭內已婚之弟兄漸有分居之趨勢，而父母與已婚之子女却少有分家者。本地已結婚之子與父母同居之家數，佔一切家數二分之一，三輩人皆已結婚而仍同居之家數，佔一切家數八分之一，四輩人皆已結婚而仍同居之家數，佔五分之一。再按無論其結婚與否而分析，則得有一輩人之家數，佔一切家數的百分之一，有兩輩人之家數佔二分之一，有三輩人之家數佔五分之二，有四輩人之家數佔十二分之一，有五輩人之家數佔五百分之一。西洋社會的家庭人口中，除父母和九世同堂的美名，必得要一個忍字，就不能發展個性，亦養成虛偽，數

循得過且過等性質。大家庭制度亦使人缺乏公衆觀念，祇顧自己家庭的利益。小家庭自然有許多好處，無須乎在這裏討論。這裏所說的小家庭，自然不是指人口少的家庭，乃是指出男女結婚後即分居的家庭。假定這種西洋社會裏實行的小家庭制度較優於中國原有的大家庭制度，恐怕亦須有很長的時間，纔能通行於中國的鄉村。不一定是因為舊習慣難改，也因為中國農村的經濟情形很有不利於實行的地方。中國大數農家的田產已經很少，難以利用機器及採用大規模的經營方法。

若再父子兄弟分起家來，對於農業經營的影響很大，是極明顯的。

關於中國鄉村人口的年齡與性別，至今尚未有大規模的研究。雖然政府有一些統計，又不甚可靠。本地調查的五百十五家中，有男子一千八百三十五人，女子一千七百三十六人，性比例為一百零六，意思就是每一百零六個男子約合一百個女子。曾看見幾個中國他處的調查，尤見不滿五歲兒童的性比例為八十五，就是每一百個女孩當八十五個男孩。這許是因為女孩生的天然比男孩多，或初生的及幼小的男孩較女孩容易死。及至五歲以上的性比例為之一變。從五歲至四十四歲每十年為一組的性比例，差不多都是男多於女，尤以十五至二十四歲為最顯然，竟至一百個女子當一百三十男子。此組女子如此少，一部分是因為女子多在此年齡期內出嫁而遭遇生產的難關。四十五至五十四

歲的年齡組內男女的數目不相上下。及至五十四歲以上的女子數目又顯然的超過男子，每一百個老太太當七十五個老頭子。假使我們可以下這樣的結論：女嬰孩多於男嬰孩，青年及壯年女子却少於青年及壯年男子，而老太太多於老頭兒。再自另一方面看，五百十五家中，十五歲以下的人數佔一切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五，十五至四十九歲的佔百分之五十，五十及以上的佔百分之十五。從這些百分比可以大略推知本地人口的增加是很緩的。

本地結婚的年齡頗幼。男子不滿十九歲即成婚者，佔一切結婚男子數的百分之七十，並且其中的五分之三是在十三至十五而娶妻的女子結婚的年齡較遲於男子。十三及十四歲出嫁者，佔一切出嫁女子數的百分之十二，自十五至十七歲出嫁者，佔百分之四十六，十九至二十一歲者，佔百分之三十四。在定縣普通情形妻長於夫，相差四五歲，甚至七八歲，是常見的。首次結婚的夫婦中，女長於男者佔百分之七十一，長於女者佔百分之二十三，年齡同者佔百分之六。在富家家庭內，男子多半早婚，也多半妻大於夫，而在貧寒的人家中，男子因經濟困難，多半娶妻頗遲，可是得到較幼的妻子。在本地，有妾的家庭，佔一切家庭的百分之一。

關於農村家庭內的許多問題，實在值得往深裏研究，並且頗有趣味。重男輕女，差不多是中國各處普遍的習慣。鄉間人看養女兒是『賠錢貨』。本地女子出嫁以後，若是生了子女，一切小孩衣物多半仍由娘家

供給出嫁女住娘家時，她的母親常常暗中積蓄些財物，好趁她女兒回家時帶去使用，怕在婆家受委屈。所以人們常說：「一個姑娘兩個賊，兩個姑娘三個賊。」這句平常語的意思是說有一個女兒的人家出兩個偷東西的賊，即指女兒本人和她的母親。如此往下推，則兩個女兒和她們的母親成為三個賊，三個女兒就有四個賊了。本地人家多半為女子早婚，為的是添一個少婦做活，因此歡迎年長的女子。這樣辦，就顯然發生幾種弊病。不但幼年男子身體的發育大受虧損，夫婦間的愛情也大受影響。結婚開始時，女子正當青春，而男子多是不懂人事或沒大用處，因此女子頗覺掃興，亦有發生事故者。及至男子長成壯丁的時候，而妻子已經半老，如此又輸到男子不高興了，也容易發生不良結果。所以早婚的惡習，是要趕快想法革除的。中國家庭內婆媳的關係，是平常有起的談話材料。本地出嫁的女子能在第一年內與她的婆婆相安無事，並却有個值得寫出的原因。本地普通習慣是媳婦要過門來，在九日之內，不管做飯，又多半在媳婦過門後第三日就有娘家人來，將一雙新夫婦接回去款待六日，叫做『住六』。然後把他們送回娘家，叫做『送九』。因此在女子出嫁後的第一年內婆媳少有不和的機會。以後住隔幾日，娘家又把女兒接回，有時連同女婿，住兩三個月，纔回到婆家去。此後住在娘家的日子很多，不過在大秋和麥秋的時候，須在婆家住一臘月。因此在女子出嫁後的第一年內婆媳少有不和的機會。以後住娘家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少，在婆家的日子漸漸增加。這婆媳間的熱鬧戲就開始了。有幾個主要原因。有的婆婆要行使她的職權，有的要調教

兒媳合乎她家的習慣。此外有的要在新媳身上施展下馬威，就是要實行那『惡使三年，善使一輩子』的理想教育。如果兒媳嬌順，或婆婆不過分的挑撥兒媳，尚可相安無事。否則漸由小事，多半由婆婆方面首先發難。由叨叨起，隨着的次序是開話，譏諷，辱罵，而至於打。所挑的毛病是沒規矩，舉動輕佻，愛說話，不會作飯，不會說話，不會做活，嘴饑，手懶，裝病，頂撞，甚至於說到娘家窮，門戶低，嫁粧不好，親家土頭土腦，親家母不漂亮。像這種豈有此理的挑剔，就是極溫順的兒媳，也很難忍受的。遇見性情不好的兒媳，豈能不出事？非她也日久天長在背地裏叨念，當面嘟噥，進而至於分辯，頂嘴，甚至趨於極端對打對罵。這是說到有一個兒媳即能鬧到如此地步。再要兒媳多了，往往彼此結合，互相攻擊。聰明伶俐些的，在婆婆前獻殷勤，婆婆再有偏心，或者喜新厭舊，那就更容易叫媳婦們有話說了。還有的婆婆愛小便宜，凡兒媳常由娘家帶好吃的東西，她就特別的喜歡。本地有句俗語說：『媳婦往娘家走，婆婆張着口。』大約寡婦和無女兒的婆婆，都疼愛兒媳。以本地而論，婆媳間真有感情的恐怕不到百分之一，彼此總算不錯而合得來的，約佔百分之十，表面上和睦而無顯然衝突的，約佔百分之四十，其餘的是顯然的不融洽而街坊或全村都曉得的。至於媳婦敢公然辱罵婆婆，是極少見的。還有一樣奇怪而令人不易解釋的現象，就是為母親的很不高興她的兒子和兒媳顯出親熱的樣子。這大約是因為母子間的愛情被兒媳奪去了不少，也許因為無形中說不定有些吃醋罷。家庭中除了婆媳的關係外，妯娌間

的關係也很叫人理會。妯娌們感情好的也不易多見，能合得來的就算不錯，大半是面和心不和，甚至於吵嘴。彼此間最容易發生誤會和惡感。

其原因也很多，例如娘家一貧一富，本人或丈夫的智慧、相貌的俊醜等，完全不同用為取笑或譏諷的材料。此外丈夫們擰錢的能力不等，更易由此發生意見。若是妯娌們都生了小孩，就更糟了。他們把素日的怨恨用「指桑罵槐」的方法，藉孩子發氣。所以妯娌越多的家庭，越不和睦。親弟兄們的彼此不和，甚至仇視，多半是他們的妻子挑動的。所以竟有這樣的俗語：「仇人轉弟兄，王八蛋轉妯娌。」家庭內姑嫂間的關係也很有理會的價值。小姑與嫂子作對是很普通的，尤其是與婆母合不來的嫂子。小姑子在母親面前背地裏說嫂子的壞話，或找機會破壞嫂子的工作。本地有一個俗語：「小姑不賢，加把鹽。」意思就是嫂子做了合口味的菜，而小姑却在人看不見的時候，偷着放上一把鹽，好叫母親吃了，罵她的嫂子。所以聰明的嫂子極力哄小姑歡喜，不但藉以討婆婆的歡心，也能省去若干的苦惱，而於工作上又能得小姑的幫忙。也有心眼多的小姑不輕易得罪嫂子，為的是出嫁後住娘家的時候，不致有人不歡迎。沒有父母的小姑，則大失其靠山，事事由嫂子作主，即或不和，也是小姑娘吃虧。家庭裏面彼此間關係最嚴而最客氣的，是大伯與小姑，或說兄與弟之妻。而相對的叔嫂之間，即弟與兄之妻，却是很隨便不拘板的。也可以從本地的俗語看出來：「寧在小叔膝上坐，不在大伯面前過。」這是何等的分別！又有一句有趣的俗語是：「老嫂比母，小叔是兒。」中國

鄉村家庭內的組織和其他狀況有許多值得描寫討論的，這裏不能多寫。

最近國府已經頒佈已嫁女子有承繼財產權，這與農村家庭的影響很大，尤其是關於田產的分裂。作者曾詢問許多農家對於這項法令的意見。他們都當作笑話看，以為是不能辦到的。至少在目前和最近的將來不易實現。此法如果實行，鄉間人更不歡迎女孩。再者，鄉間人的財產，大半是田地，少有現金。出嫁女子所承繼者，亦多為田地。如此使田場和田塊愈分愈小，於經營上發生困難。賣賣與抵押田地的事情，亦必隨之增加。現在大多數的農家已經覺得嫁女費用的困難，再要分給家產，是他們不能想像的事。這種男女平等的原則，固然是很好的，但在農民知識如此低的時候，應當考慮實行的弊病，也不要過於反對人民的心理和習慣。要緊的是設法增進老百姓的知識，提高他們生活的程度。不然，無論是打倒或建設，都是難辦到的。

六十二村共有一萬四百四十五家，平均每村一百六十九家，最大之村計四百五十八家，最小之村計十九家。六十二村內共計一百十一姓氏。家數最多者為王姓，計一千四百十九家；張姓次之，計八百五十六家；再次為劉姓，往下排為李、馬、趙等姓。

六十二村內以自耕農為最多，佔一切農家的百分之七十一半。自耕農次之，佔百分之二十八；佃戶很少，僅佔百分之一。自耕農所經營的農場面積，佔一切農場面積的百分之七十二，平均每家種二十六畝。半自

耕農的農場面積佔百分之二十七，平均每家種二十五畝。佃戶面積佔百分之二，平均每家十三畝。種田不滿五十畝的農家佔一切農家的百分之八十六，五十至一百畝的農家佔百分之十二，一百畝以上者佔百分之二。不滿五十畝的農家耕田的總畝數佔一切農家耕田畝數的百分之五十五，五十至百畝的農家耕田畝數佔百分之三十一，百畝以上農家耕田畝數佔百分之十四。這樣看來，本地之多數田畝是屬於普通農家，沒有特別富厚的大農。在本地上等田地之租金約等於田價的百分之一六，中等田地約為百分之一零二分之一，下等田地約為百分之零二分之一。例如上等田地每畝價值百元，其一年租金約五至七元。若將一百元放債，則全年能得二十四元利息。繳納田租之時期，多在春季三四月內。現款納租者為最多，因為先交錢，後種地，是很方便的辦法。亦有少數以農產物納租者，例如在秋收後每畝繳棉花三十八斤，或穀子六斗半，或小麥三斗半。

人民並不不懂衛生，是甚麼東西，就連用不着花錢的空氣和日光，也不會盡量享受。住的土房內面多半是光線不足，空氣不很流通，尤其冬季，夏天也很潮濕。有許多廁所和飲水井的距離是在四十尺以內。平常人們得了病也不留意，非到很重的時候，纔慌起來去找附近的醫生。在六十二村內找得見醫生的有四十二村，共有九十個醫生，平均每一百十六家合一個醫生。他們的資格如何且不必管，凡肯應承人去治病的，就算為醫生，本地人稱他們為先生。九十個大夫中稱為儒醫的有

八十五人，有三個是在醫學校畢業或受過訓練的西醫，有兩個用鄧集治病的。其中專治內科者計五十八人，外科十三人，兼內外兩科十一人，小兒病，眼疾，獸醫，癩犬及婦女病各有一二人。年長之醫生居多，過四十歲者佔五分之四。雖然他們多半不收診費，但都是附帶賣藥，且所收藥價頗貴。對於貧苦農家，格外體恤，不多收費。

民國成立以來，農民所受的最大困苦之一為兵災，向來尚未有詳細的調查，也極難調查。本地六十二村在民國十七年因內戰所受的損失，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由縣政府及駐軍強迫徵收者，例如討赤費，索要糧草等，一種是由兵丁直接掠奪者。在本地會詳細調查這兩項損失。民國十七年全年内在六十二村由徵收所受的損失總數約為七萬一千七百元，平均每村損失一千一百餘元，每家損失七元。由兵丁掠奪的損失約計三萬九千八百元，平均每村六百四十元，每家四元。兩項損失合計約十一萬一千五百元，平均每村約一千八百元，每家十一元。按定縣所遭兵災的損失，比起中國許多別的地方並不重，尚且每家在一年內損失十一元。若以此數推算全國一切農民的損失總數，一定極驚人了。在民國十七年內，六十二村內被兵丁掠奪的村莊計四十二村，其四百三十五家，損失的財產以牲口為最多，共計價值二萬一千餘元，現款次之，計七千餘元；衣服被褥等又次之，再次為車輛農產等物。在民國十六年，六十二村內因兵丁掠奪所受的損失值價二萬元，平均每村三百元，每家兩元半。

農民對於政府差不多完全失了信任。無論政府有甚麼建設的好題目，老鄉民是畏懼，不放心，至少是懷疑。在農民心裏，一提到政府，就聯想到增稅加捐，一想到縣長，就是刮地皮。梁漱溟先生說：「中國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強似鐵鉤。亦許握鐵鉤的人好心好意來幫豆腐的忙，但是不幫忙還好點，一幫忙豆腐一定要受傷。」這個比喻很有些真理。他又說：「現在全國黨政各界有一句時髦的話，叫作『建設』，不知老百姓最怕聽這句話。」鄉間各種稅捐也未免過於繁雜。附加稅、地畝捐、自治捐、戶籍捐、警捐、學捐、屠宰捐，以及多種人捐或辦款，把老實鄉民擾得可憐。恐怕這些捐稅政府未必能收到一半，大半都入於牙行及多層的手了。自「免除苛稅雜捐」的標語出現以來，並看不出實際情形比從前好，又叫人民失一次望。前者本縣亦嘗勒種鴉片，煙苗已發到縣公署。而本地明達的士紳竟能以縣內地方公款撥用一部分繳納此項惡稅，使本地農民脫離種煙之害，實在是一件大功德，也是極令人佩服的事。不知何年何日政府纔能挽回人民的信任。可憐他們仍然是希望著真龍天子呢！

定縣人民雖然大致都有飯吃，但離家家有餘的地步還遠着呢。時常借貸的農家很多。一年之內，農民中差不多有一半借貸的。抵押品的四分之三為田地，此外有房屋、紅契、字據、殷實保人等項。大約抵押品的價值須超過借款的一倍。借用期限以一年十月，或八月為最多。利息普通二分，亦有高至三分者，低至一分半者。可惜借款大半是用於非生產方

面，例如家中虧空，還賬，婚喪，購糧，甚至於吸煙、賭博等嗜好用於生產方面的，如買田、經商、鑿井者頗少，大約不到五分之一。

人人差不多都知道交通與一個地方的商業和文化大有關係。凡到國西部太平洋岸乘汽車東行，用了一個月的時間至東端大西洋岸所留的最深印象，是凡經過的地方，無論是城市、鄉村、山野，一律是平坦、過歐美的，再看中國的交通情形，不得不令人嘆息。作者曾有一次自駕，戶籍相，警捐、學捐、屠宰捐，以及多種人捐或辦款，把老實鄉民擾得像溝一樣。天氣乾燥的時候，溝道是很厚的細土，而任夏季多雨的時候，即成爲存水的小河，至少也是很深的稀泥。經過的車時常陷入，將牲口打的要死也拉不上來。可是不但政府幾乎永遠問，就是自身受害的農民，也是袖手旁觀，大家不聯合起來修理一下。本地最普通的運輸方法，是木料做的大車，每輛約七八十元。鄉間這種天然的土道，也非用這種堅實粗重的大車不行。普通每輛車可以用十五年。大車不但拉運東西，也是人們常坐的。每日能行八十里，載重五百斤。若用兩個牲口，可載重八百斤。大車外常用運東西的，是當中有一大木輪的手推車，每日約行七十里。此外稍講究些的，有坐人的布棚轎車。定縣到鄰近的安國縣，已有長途汽車通行。城內的人力車和鄉間的腳踏車，一年比一年多。平漢鐵路在定縣境內有三處車站。近二年內多半不能按通車時刻表開車。車輛不但破舊污穢，並且總是不足用的，就是在冬季極冷天氣的

時候，火車頂上仍是坐人，且有婦女和兒童在內，因為車廂內也是擠得毫無立足之地。車上凍死人的事已經不算希奇。自定縣至北平五百里的路程，常用二十小時之久。有一次在舊曆年時，作者自定去平，在車廂的人堆中凍立一日夜之久，而兩個某集團的大兵與其親屬却圈定了一塊能躺下大睡的特別區，不時的打罵不得已挨擠到他們區界的人，也數次要把作者的行李扔出車外，並且怒目橫眉的說：「別人上得去，車頂，你不是人，上不去麼？」這種境況似乎夠難堪的了。及至和車上附近的難友談起話來，纔知道別不自足。有的說：「有一個坐在車頂上的客人曾被空中懸的一條鐵線將頭割掉。」又有的說：「火車經過河南某處，坐車的人坐得太不耐煩時，可以跳下車來，隨着火車前行散散步，或便湊一下，再從容的爬上車來。」作者聽得自己是少見多怪。

在六十二村內，有一千四百多回教徒，三百多天主教徒，三十多耶穌教徒。其餘的人也說不上是甚麼宗教，他們說是信平常的大教也模模糊糊的說是佛教。人們對於宗教的信仰，似乎漸漸不如從前的濃厚。關於破除迷信，尤有顯然的事實。在六十二村內，原有各種廟宇四百三十五座，內有偶像一千一百五十七個。自民國三年孫發緒縣長廢廟興學以來，前後毀除偶像的廟宇甚多，共計三百三十二座。因此六十二村內現有廟宇僅存一百零四處，共計偶像四百零四個。平均計算，原來每村合七個廟宇，每二十四家合一處廟宇。現在每村合一兩個廟宇，每一百二十一至二十四日，不但定縣的人民差不多拿牠當做一個節令來過，就是鄉縣的農民也留心這個日期。附近村莊的農夫、工商、學校都停止

百三十五座廟宇中最多者為五道廟，計六十八座；其次為老母廟，計十四座；再次為關帝廟，計四十座；往下排為真武廟、三官廟、奶奶廟等，並有孫悟空、禿尾巴老張等不倫不類的廟宇，共計六十餘種。供奉之神有三十八樣之多，以五道、南海大士、關帝、真武、佛為最普通。原有廟宇共有房屋八百九十九間，現有廟宇共有一百七十一間。六十二村在五年內公衆敬神之費用總數約為七千七百元，平均每村一百四十元。以舉行廟會用錢為最多，求雨費次之。此外為顯聖、免蟲災、免兵災、免旱災、免病災、免水災等費。本地有不少佛教和道門之團體。在六十二村內，有佛教會會員八百五十餘人，背糧道五百七十餘人，聖賢道二百四十餘人。此外尚有九功道、香門道、坐功道、靜心道、金香道等團體，總計二千餘人。鄉村人民很注意廟會。每年到廟會開的時候，村內首領人就集在一起，商量辦法。廟會的經費，是按村中住戶家中地畝的多少斂錢。廟會普通四日，也有到半月的。每逢廟會，多半演戲。農民生活平日很單調無味，因此廟會是他們很少有的消遣。凡有廟會，必有集市，人民可以買賣物品。鄉民平日不常往來，在赴廟會的時候，順便看望親友。但這項應酬費用頗為不少，貧寒的人家感到困難。凡由廟會所贏餘的錢，即歸入村中公款。廟會也有弊病，如養成迷信，發生賭博，及無賴藉端生事。但廟會之勢力和影響頗大。以本地的一個韓祖廟而論，開廟的日期是每年三月二十一至二十四日。不但定縣的人民差不多拿牠當做一個節令來過，就是鄉縣的農民也留心這個日期。附近村莊的農夫、工商、學校都停止

工作來紀念。家家預備粽子，饅頭，河洛麵條等食品吃用。燒香的，作買賣的，看戲的，逛廟的，把廟的內外，幾乎全村面積都擁擠成人山人海。在開廟的前一日，許多因病許願的都數步一頭的叩到廟內燒香，並且即在廟中「坐夜」。每日到廟的，不下萬人。

凡自城市到農村來住的，不久即覺得鄉間生活的單調。農民除了春耕秋收，娶妻生子外，平日極缺少娛樂。新年，自然是舊曆，是農人最快活的日期。自正月初一至十五半月之內，許多的舉動給他們開心解悶。作者曾有一次向一個老農婦說：「政府要禁止人民過陰曆年啦。」她立刻現出極驚訝的面孔說：「真的麼？這可怎麼好啊！我們的新衣裳怎麼辦呢？」她的意思是說：新衣服是為過新年時穿的，沒有新年，新衣服也就沒用了。鄉民不注意陽曆年，而歡喜陰曆年，不一定完全因為他們的習慣難改，也實在有實際上的便利和不便利。當陰曆新年時，嚴冬纔過去，而天氣開始暖和。因此無論有甚麼動作都很方便，例如看望親友，在街上搭臺演戲，以及農民組織的各種娛樂會社的表演。過了正月十五以後，農民就開始忙起種地了。在陽曆新年時，正當天氣最冷的時候，農民的衣服又穿的少，很難有甚麼戶外娛樂的舉行。自然尚有別的不便利處使他們不歡迎更改過新年的日期。在過舊曆年的時候，各村都接連不斷的舉行燈會，獅子會，小車會，及演戲。但在定縣最普遍的娛樂是秧歌。本地的秧歌並不是腳底下綁木棍的高蹻會。說起秧歌的起源，頗有趣味。相傳蘇東坡治理定州的時候，他看見種稻的農民在田間工作

很苦，就為他們編些歌曲，教他們在插秧子的時候唱，藉以減少他們的疲倦，增加他們的興趣。因此叫為秧歌。不久歌曲傳遍三定縣，現在鄰縣也有演唱的。歷時已久，自然字句和聲調發生許多變化，漸漸變為戲曲，簡直現在已經是小規模的演戲，亦有與唱蓮花落相似的地方。演唱時也搭起容得下四百多人的席棚，用幾種普通樂器，秧歌有整套的辭句，有的是很好的平民文學，但都是口傳下來的。曾有一個唱秧歌的人，外號人稱萬人迷，能每日背誦秧歌辭八小時，繼續至一月之久，而語句不重複。他不識字，完全由口傳學來。這種記憶力令人驚異。差不多各大村皆有能唱秧歌的。二三十人即可組成一班秧歌會，置備綵衣，樂器，簾帳等物。每到新年正月，村民約請他們演唱，供給費用。大約一班秧歌每日須用十元，由村中各戶攢派。村民，尤其是婦女，都穿得齊整，高興的來聽秧歌。普通連演四日，也有延長至十日的。民國十七年，政府以其腔調和表演有傷風化，出示禁止，但毫未發生効力。作者覓往看過幾次，並未發見了不得的弊病，較北平天橋的戲辭還文明呢。且這種秧歌的辭句非常淺近，韻調也不錯，表演很有生氣，鄉孺皆能聽得懂得，清者能稍加改良，不但是人民最大的娛樂，也能藉以增進他們的知識，不啻輕易的把牠根本剷除。農民的娛樂本來就不多，再把新年廟會，秧歌都禁止起來，那末，他們冬季吃飯以外，就祇可蹲在牆根晒太陽或喝西北風罷。現在許多人祇知打倒和破除。至於打倒某項習慣以後，拿甚麼較好的來替代，却少有人用工夫思索。如此的大打一陣，社會不但不能改造，恐

怕連原有一點生氣也給摧殘了。這實在是危險而可為憂心的現象。如何來增進農民的健康的娛樂，真是一個目下很重要的問題。

本地風俗很好，沒有顯然不良的嗜好。除新年外，平日賭博的很少，醉酒的也極少見。吸紙煙的却一年比一年多。普通所用紙煙的牌號是「第一」、「大鶴」、「聖孩」、「大聯珠」、「哈德門」、「愛國」、「紅錫包」等煙。普通農民仍然多用旱煙。吸紙煙的多屬紳士、商人、教員、學生和有錢的人。吸鴉片的極少，在大村內許能發見一兩個婦女少有吸煙的。吸紙煙的費用，一人每月約一元多，旱煙約四角上下，用鴉片的少有過十元的。普通紙煙一盒約大洋三四分，旱煙每斤二三三角，鴉片每兩四五元。本地近年來吃白玩，金丹，打嘴咈者，一年比一年多，是由日本運來。這是可怕而應注意的新嗜好。

關於鄉間人的性質和習慣，許多是人不能不理會的。他們的節儉、勤勞、和平、忍耐、退讓、知足、安分守己、聽天由命，都是很顯然的。中國如此多的農民，處在這種困苦，至少是極簡單的生活中，而能相安無事，就是因為有這些性質維持他們。除非萬不得已，少有肯為非作歹的。他們許多別的性質和習慣，如模糊敷衍、麻木不仁、無情、怯弱、虛偽、多疑，過於講面子，守舊、不進取，缺乏公眾觀念，不清潔、不合作，缺乏組織能力，也是頗顯然的。這些性質養成他們萎靡不振的狀態，衰弱的身體，而使農村生活缺少生氣。至於如何改正農民的弱點，而保守他們原有的優點，是極精細的問題，非有許多人鄭重的下工夫研究方法不可。如果不加思索，

草率從事，恐怕不但於農民無利，而反發生許多新的毛病。現在的農民雖然時刻受着經濟的壓迫，不但看不出他們有甚麼煩惱，而且埋怨他們頗似快樂，至少是知足。作者自從與農民住在一起之後，心中常有一個懷疑的問題：就是如果增加了農民的知識，也提高了他們的生活程度，敢保證他們那時候一定比現在快樂麼？知識，尤其是書本的知識，貨財真能增進他們的幸福麼？我們焉知道他們所發生的新痛苦不超過他們所能享受的新幸福呢？如果社會的改變不能增加他們的快樂，就無須乎費力不討好的多事。換一句話說，改造是可以的，可是要緊的，須得住好裏改造。若是改了半天，結果還沒有原來好，那不如不改，何苦空費力氣。已往對於人民的設施，尤其是出於政府的，有許多是所得與所期相反的。

近來對於鄉村的改造，不但政府注意提倡，更有不少社會團體也向這一方面集中他們的精力。社會認為或自認為的教育家、農學家、政治家、社會學家，及其他有專門學識的學士、碩士、博士們，有的真實行到鄉間來工作了。並且都是很熱誠，也抱着很大的希望來的。於此作者一方面從他們談話的口氣中，及他一方面從農民所得印象裏，發生了一種感想。這個感想，或者能用一個比喻來說明。

中國的農人如同一隻牛，中國的鄉村社會好像一輛牛車。有專門學識的青年，尤其是留外洋新回國的博士，如同一個有高等技術的飛行家。農村社會的變化，好像一輛牛車的移動。一個專門學者，尤其是沒經

驗的，來到鄉村從事改造事業，也好比一個飛行家來坐在牛車上要趕牛。專門學者來到鄉間一看，處處都不合他的理想，樣樣都急須改造。他恨不能一時把他建設成一個最新式的理想的社會，於是立刻實行他所懷抱的高明辦法。這也就如同那個飛行家一坐在牛車上，就覺得牛車的進行實在太慢，就用新方法催牛快走，忍不住打起牛來，使牠奔跑。其結果不出這幾樣。牛向來拉車是慢慢走的。你若逼牠疾行，牠賤氣子臥下不走了。若挨近緊催牠，牠也許用蹄子踢你，用角頂你。這是一種結果。他雖有駕飛機的本領，也無濟於事，也許氣死啦。要不然，牛是個馴良的，不計較這位飛行家的鞭打，就盡着牠全身的氣力飛跑起來。飛行家此刻看有些意思，沒想到牛跑了一陣，精疲力竭，倒臥地下，不能行動，從此病起來，愈來愈瘦弱，也許嗚呼哀哉了。飛行家看見這樣結果，祇有失望，嘆息，悲痛，覺得他的本事，熱心都白費了。讀者要知道有許多人到民間去以後是如此的失望。因為他們的理想過高，也許太差，從事過猛，

也許方法不對；恨不能一時把農民的知識提高了，把他們的社會徹底的改造了，却忽略了一層細密的研究。不深了解農村社會的自身，就以爲有把握的瞎幹起來，豈有不糟？作者敬告熱心的專家，若真有改造中國社會的決心，先勿立刻施展他那駕飛機的技能，開始慢慢的學趕牛；根據人民的程度，一步一步的，漸漸實行改良的計劃。如此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學習，腳踏實地的進行，終有達到近於理想社會之一日。這樣的中國農村社會，想要把牠在短時期內有絕大的進步是不可能的。牠的進步須先從牛車漸變爲馬車，再由馬車而汽車，而火車，而至於飛艇。等到社會程度有如飛機的時候，專門的學者即可施展他所學的本事，駕飛機罷。總而言之，中國的鄉村社會改造事業，必須按照妥當的步驟，逐漸進行。求速必出毛病。現在大家要趕緊到民間來，調查事實，研究方法，然後再下手工工作，就不致開始走錯了路。